



我国当代西文编目工作的积极推动者

——纪念韩荣宇先生诞辰 100 周年

□林明* 王静

摘要 总结了韩荣宇先生在解决图书编目历史遗留问题、推行国际著录标准、开展编目规范工作、恢复完善西文主题目录、培养人才等方面为我国当代西文图书编目工作所作的突出贡献。

关键词 韩荣宇 中国图书馆史 西文编目

分类号 G259.2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4.02.013

2024年7月24日,是韩荣宇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本文借此机会记述韩先生为推动我国西文编目工作走向现代化所作的贡献,以此作为对他的缅怀和纪念。

1 生平简介

韩荣宇先生是北京人,他家所在的海淀镇距燕京大学(以下简称燕大)校园很近,父亲是燕大图书馆的馆员,因此他从小耳濡目染,受到燕大文化气氛的熏陶。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军封闭了北平由英国教会创办的几所中学,这几所中学与燕大存在着“承认”关系,即燕大可优先录取这些学校的毕业生,经过与燕大协商,由英国圣公会创办的崇德中学(杨振宁、邓稼先曾就读的学校,今北京三十一中)以原教学班子和设施迁至北平西郊,以燕大附中高中部的名义复学,韩先生入该校读书。燕大附中秉承崇德中学的传统,除国文课以外,其他各科均以英语授课,韩先生在这种学习环境中练就了一口娴熟的英语。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日军封闭了燕大,燕大附中不复存在。韩先生离校后,不愿报考日本人指定的大学,而选择了天主教会办的辅仁大学教育系,并兼修西语系课程。抗战胜利以后,韩先生于1946年毕业,获教育学学士学位,他在校期间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秘密加入北平地下党组织,1948年8

月,国民党宪兵到韩先生在海淀镇的家中去抓捕他,幸而那天他住在清华大学没有回家,才得以幸免。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韩先生服从党组织安排,参加接收北平的中学教育工作,先后担任几所中学的校长。其间被选送到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学习,成为该校首届毕业生,1954年当选为宣武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韩先生出身于教育专业,又投身于教育事业,热爱年轻学生,在担任中学校长期间,表现出了突出的领导能力和教学才干。20世纪50年代以来,韩先生的境遇坎坷不平,受到错误批判,直到1979年“文革”结束,拨乱反正,韩先生的所谓问题才得以解决,并恢复了党籍。在20年蹉跎岁月中,韩先生是在被压制和审查的环境中度过的^[1-2]。

1977年韩先生来到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图书馆工作,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道路,他以扎实的英语功底和对图书馆工作的热爱,积极钻研业务,协助北大图书馆副馆长梁思庄先生开展编目工作。梁先生慧眼识珠,爱惜人才,看到他的业务、外语和组织能力都很突出,很快委以重任,请他主持西文图书的整理和编目业务^[3]。此后韩先生在北大图书馆工作20年,在培养西文编目人才和学术业务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起到了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作用。

* 通讯作者:林明,邮箱:linming@lib.pku.edu.cn。



2 妥善处理北大图书馆编目工作的历史遗留问题

韩先生刚到图书馆时,首先面对一项规模较大的工作,即1975年开始的整顿旧藏西文图书的工作,其内容是将原北大图书馆与燕大图书馆各自的西文图书统一集中排架。原北大图书馆与燕大图书馆于1952年合并,虽然两馆西文编目分类都采用“杜威分类法”,但具体处理方式存在差异,经常出现同一种图书的索书号不同(即“同书异号”),或者出现不同种图书的索书号相同(即“异书同号”)的现象,特别是“异书同号”会给读者带来很多不便,因此首先需要将“异书同号”的图书合并为燕大图书馆的索书号,以便集中排架。由于编目日常工作繁忙,这项工作被长期搁置,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启动。这项合并工作十分繁琐细致,需要频繁进入书库将图书和目录卡片逐一进行核对,并且在卡片和图书上同时修改索书号,不能出现差错,工作量很大。在韩先生的精心组织下,几年来除了部分宗教类和极少数文学类图书,以及某些零散不常用图书以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西文图书的合并工作得以完成,使得西文藏书长期存在的排架问题基本解决。

韩先生面对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将图书馆积压多年的未编目西文图书清理出来进行编目。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刚结束,百废待兴,图书馆十分缺乏外汇购书经费,可供编目的西文新书不多。由于历史原因,图书馆又积压了大批未编目的中外文图书资料,被打捆存放在北大俄文楼和红二、红三楼的大屋顶里,堆积如山,积满灰尘。韩先生亲自带领人员到灯光昏暗的楼顶拆包、查看和挑选,不顾脏和累,翻检出了许多20世纪早期甚至19世纪西方国家出版的图书,以文学、历史、经济、哲学为主,有的图书装潢精美,具有珍贵的收藏价值。这些图书埋没多年,经整理终于重见天日。韩先生通过馆里临时招聘退休人士,经过初步培训,编制简单记录的卡片(即“简编”卡片),使这批图书得以早早上架,使读者需求无法满足的状况得以缓解。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购置外文图书经费的增加以及国际交换的增多,重点也就转向了新进口图书的编目工作,无书可编的情况终于缓解,“整旧”工作也随之终止。此后韩先生的工作重点转向了西文新书的编目工作。

3 在国内率先采用国际著录标准和本地化编目规则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编目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国间广泛开展书目交流,计算机开始大规模应用于编目工作,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IFLA)自1978年以来陆续出版了《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ISBD)的系列分册(ISBDs),《英美编目条例》第2版(*Anglo-American Cataloguing Rules 2*, AACR2)也于1978年问世,以上变化给国内编目工作带来了强烈冲击,同时国内也大量引进西文图书,急需加强编目力量,韩先生作为北大图书馆编目部副主任和西文编目业务主持人,敏感察觉到这一变化,他首先及时组织西文编目人员学习ISBD专著分册,又于1983年初组织西文编目人员系统地学习AACR2的有关内容,在实际工作中积极贯彻以上标准和规则。在韩先生的带领下,北大图书馆成为我国最早推行ISBD和AACR2的图书馆之一。1983年8月,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与全国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分会在北京香山联合召开“西文图书编目标准化与自动化研讨会”,韩先生在会议上介绍了北大图书馆试用AACR2的经验,并作了关于AACR2新增“统一题名”规则的报告,首先将“统一题名”概念全面介绍给国内编目界。到会人员一致决定以ISBD和AACR2为基础,结合我国国情编制本地化的编目规则,并且由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和北大图书馆共同负责,并由北京图书馆的刘光伟老师和北大图书馆的韩荣宇先生担任主编。韩先生对审订初稿十分认真细致,或在初稿纸面上批注修改意见,或与编写人当面磋商,力求规则条文表达准确精炼,并在碰头会上进行讨论,对最后文本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于1985年8月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出版,为国内西文编目实现国际化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以后实现计算机编目铺平了道路。该条例在体例方面,特别是在对中国的个人、团体和地理名称标目方面更适合国内读者习惯,更具有中国特色,在国内使用时间长达18年,对国内西文编目工作的标准化发挥了积极作用,直至2003年7月才被修订扩大版所代替。

1988年春,国内编目界又开展了一项重要工



作,即由全国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分会组织翻译《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的系列分册,该系列分册包括专著、连续出版物、测绘制图资料、非书资料等分册,其中除了连续出版物分册由上海图书馆负责翻译外,其余分册由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图书馆负责翻译。韩先生负责各分册译本的审校工作,在各次碰头会上对一些焦点问题进行了讨论,如各分册条文表述和术语的翻译差异问题,特别是对一些英语术语中译名的不同意见,韩先生集思广益,做出了最后拍板。《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的系列分册中译本于90年代初出版,有力促进了国内文献工作的标准化,20年来,该系列文本一直是我国编制中外文编目规则的重要依据。直至本世纪初新的《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统一版)》正式发布,原版的系列分册才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4 在国内率先开展图书编目规范工作

编目规范工作是一项有效实现书目控制的核心工作,在国外图书馆开展较早,制度也比较完善,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带来的全球资源共享,规范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得到了迅速发展,IFLA于20世纪70—80年代发布了有关规范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但当时国内编目界对规范工作尚未形成清晰全面的观念,一直停留于编制简单的参照卡片,规范工作并未全面开展。20世纪80年代初,韩先生在西文编目工作中注意到有一些学术专著虽然属于同一丛编,但从编题名形式有差异,无法有效集中这类专著,为解决这一问题,他根据AACR2的“统一题名”规则,建立了丛编题名规范文档,编制了丛编题名规范卡片,以便在规范丛编题名下集中相关联的学术著作,已集中分类的,还要注明集中分类号,使这类学术专著在书架上排列在一起,大大方便了学术研究^[4]。丛编规范文档的建立是北大图书馆正式规范工作的开端,为了使西文编目工作协调一致,使规范工作进一步发挥作用,韩先生于1983年亲自审订了《北大图书馆西文编目规范工作》条例,并于1986年进一步修订,使规范工作作为北大图书馆西文编目工作的一项核心工作全面开展起来,除了编制个人名称、团体名称和统一题名的规范记录卡片外,还从编目部的公务目录中抽取分散的参照卡片,重新组织为名称规范文档,为使用方

便,还设置了一个专门存放规范文档的小型目录柜。在名称规范文档中,还为著名文学家和哲学家设置了专门索书号,集中分类,使这些名家著作以及相关评论作品在书架上集中在一起,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不仅如此,韩先生还考虑到,在国内按不同语种分立的目录体系中,除了各语种编目工作应建立自己的规范文档外,还应考虑各语种目录的相连接问题,例如,他认为中外人物或团体名称的不同语言文字形式,有必要在各语种目录之间建立联系,又例如,他曾提到,国外原版图书的国内影印版出现新增中文并列题名时,有检索意义时也应为并列题名设置检索点,排列在中文目录中,增加新的检索途径,并在实践中也做过尝试。在当时手工编目的背景下,韩先生考虑到不同语种目录之间的连接问题,虽然这一设想在当时条件下还很难实现,但却是有前瞻性的。为了提高对规范工作的认识,在韩先生的倡议和指导下,北大图书馆西文编目人员翻译了国外有关规范工作的著作并正式出版,在刊物上发表了有关规范工作的论文,有力宣传并促进了国内规范工作的发展。现在,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联机目录系统已经建立“多语种并列规范名称文档”,并且在不断积累和完善,韩先生当年的梦想终于初步实现。

5 恢复和完善北大图书馆的西文主题目录

北大图书馆的西文主题目录是编目工作的一大特色,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北大图书馆一直购买和采用美国出版的《国会图书馆主题词表》(以下简称《主题词表》)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制发行的成套目录卡片,这些成套卡片也包括了主题款目,可直接用于北大图书馆的主题目录。由于历史原因,1949年以后国内图书馆无法继续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成套目录卡片,许多图书馆因而停止了主题目录。但北大图书馆在梁思庄先生的领导下,坚持自主编制西文主题目录,培养编目人员的主题标引能力,使主题目录一直延续下来^[5]。北大图书馆西文主题目录在国内各大图书馆中是持续时间最长、内容也最完整的,成为北大图书馆西文目录的亮点,编制主题目录的能力标志着一个图书馆具有较高的编目水平。但在“文革”期间,北大图书馆西文主题目录被迫停止编制,使北大图书馆主题目录中断了多年。



自1979年开始,北大图书馆西文主题编制工作逐渐恢复,并对读者开放。主题标引工作的开展,既满足了读者的学术需求,也是计算机检索科研课题的重要途径。由于梁先生身患重病,恢复主题标引工作的重担就落在了韩先生的肩上。韩先生组织西文编目人员系统地学习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主题编目原则和方法,并连续订购国会图书馆发行的《主题词表》《主题编目工作手册》《编目公报》等更新版本,及时了解国外最新动态,提高主题标引的质量。在使用美国国会图书馆《主题词表》时,韩先生很注意其政治倾向,凡是涉及我国事物的主题,特别是政治、历史和地理方面,均坚持采用国内的原则和政策,而不是盲目照搬,比如在对“台湾”地名的处理问题上,韩先生要求将该主题词改为“台湾(中国)”,而当台湾省作为地理复分使用时,则要求将该地理复分改为“中国—台湾”,而且对台湾省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所谓“外交关系”也做出了适当处理。又如,《主题词表》将我国东北地区以旧称“满洲”,则改为“东北地区(中国);又如,《主题词表》对“太平天国”贬称为“动乱”,则改为较正面的“起义”等。韩先生还对美国国会图书馆主题标目中出现的对中国地名的标引错误,比如某些中国县名的拼写发音相同而原汉字不同,将地理限制词错标为另一个省的情况,改为正确省名,并给美国国会图书馆发函说明(当时尚未使用电子邮件),美国国会图书馆及时回函表示谢意并做出更正。此外还应提到的是,国内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的语言文字政策,用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团体名,但美国国会图书馆对这些名称却一直坚持采用早已被国内废弃的威妥玛式拼音法,针对这种情况,韩先生要求对中国人名、地名和团体名均改用汉语拼音(国际惯用形式除外)^[6],而美国国会图书馆直到2000年才改用汉语拼音(见2000年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公报》)。在韩先生的带领下,北大图书馆西文图书的原始编目除纯文学作品以外,全部标引了主题。

6 注重培养编目人才

韩先生在长期担任西文编目总校工作的同时,很重视提高西文编目人员的业务和学术水平,如上文提到对ISBD、AACR2、《主题词表》等文献的集中学习。例如,他在组织大家集中学习AACR2时,充分运用了当年的教学理论和经验,深入浅出,逻辑清

晰,需要用英语表达时,一口标准洪亮的美式英语以及规范潇洒的英文板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除了亲自讲课外,他还把AACR2一些重要章节分配给各编目人员进行书面翻译并在集中学习时进行讲解,由韩先生加以补充说明,以加深大家对AACR2的理解。为了发展各个编目人员的业务强项和学术能力,他提出了编目业务研究的几个重点和方向,例如编目规则研究、主题分类研究、规范工作研究等,希望大家能坚持不懈地钻研下去,日久必有成就,他还鼓励编目人员阅读英文原版的编目著作,如怀纳(Wynar)所著《编目与分类导论》,麦克斯韦(Maxwell)所著《AACR2手册》等著作,从中吸收国外先进编目理念,提高英语阅读能力,打下扎实的业务基本功^[7]。1992年,北大图书馆根据国家教委文科文献情报中心的要求,组织西文编目人员编写了《西文编目标准化研讨班讲义》(上下册),内容包括著录、分类、规范工作、USMARC及光盘编目系统、主题编目等章节,反映了国外最新编目动态和计算机编目进展,这是对北大图书馆西文编目水平的检验,编写工作自始至终都得到韩先生的指导,他还审订了全部讲义内容。随后,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委托北大图书馆举办了几次全国高校图书馆的西文编目培训班,编写人员采用自编的《西文编目标准化研讨班讲义》讲课,韩先生亲自讲授了编目工作总论(未编入“讲义”),即编目原则和目录职能等较深层次的问题,介绍了1961年IFLA颁布的《国际编目原则》(惯称《巴黎原则》)^[8]。由于受到特定时代限制,《巴黎原则》多年以来在国内未被广泛宣传 and 认知,韩先生在每次讲课中都介绍了《巴黎原则》的核心内容——目录职能,包括检索和汇集两大职能,阐述了“主要款目”概念及其作用,强调了“原则要置于规则之上”“读者便利原则是首要原则”,韩先生的讲课使来自国内各高校图书馆的学员耳目一新,开阔了眼界。2008年,IFLA颁布了经过修订扩充的《国际编目原则》,替代了1961年的《巴黎原则》,其中目录职能重申了检索与汇集的基本职能,并扩展到媒体多样化和网络交流的需求功能,同时继续强调“以用户便利为最高原则”,韩先生早在八九十年代就全面介绍了1961年《巴黎原则》,可见他对编目工作的发展有着深邃的学术洞察力和理解力。在80年代初期,韩先生还亲自主持了几次外籍编目专家的AACR2编目培训班或报告(其中影响



最大的是美国加州大学图书馆的曾程双修女士讲授的培训班),国内许多大学图书馆的编目人员前来参加,座无虚席,当时电脑教学方式尚未开展,采用的是幻灯投影教学方式,韩先生为了加强教学效果,组织印发了许多教学资料,用于显示实例,组织答疑等,有力促进了 AACR2 在国内的推广。21 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图书馆的西文编目培训工作由 CALIS 联机编目中心承担,不再由北大图书馆负责,培训教学工作由各高校图书馆的老师轮流担任,有部分老师曾参加过当年北大图书馆举办的西文编目培训班的学习。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北大图书馆西文编目工作条件不断改善,先是每年购置《美国全国联合目录》的年度印刷版,然后是购置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缩微目录(借助缩微阅读器),给编目工作带来很大便利,尽管如此,韩先生认为,一个优秀的西文编目人员不仅要熟练掌握当前使用的基本编目工具,如编目规则、分类法、主题标引词表、规范工作等,还要了解和使用各种必备的西文参考工具书,不断充实自己的头脑,做到强记博闻,如百科全书、人物传记资料、年鉴手册、联合目录等等,他本人为了在编目工作中答疑解惑,也经常不厌其烦地查找各种资料。北大图书馆和燕大图书馆都是历史悠久、收藏丰富的图书馆,在编目史上经历了几次编目规则、分类法、主题标引法的不同版本变更,以及两馆合并后带来的一些业务和技术问题,这种变化必然会在目录中表现出来,经常使编目员陷于困惑。韩先生认为,历史悠久的大图书馆编目人员除了做好当前工作外,还应当适当了解本馆的编目沿革史,才能使业务基础更加厚实,增强处理疑难问题的能力。他对北大图书馆西文目录历史做了调查研究,编写了一份关于北大图书馆西文目录的历史、现状及问题的大纲,列出了在不同年代使用的编目规则、分类法、主题表的各种版本变化,供编目人员参考^[9]。韩先生的学术水平、治学态度和渊博知识使他名声在外,不仅北大图书馆学系(今北大信息管理系)的老师和研究生常来编目部找他探讨各种学术问题,甚至兄弟院校图书馆或外省图书馆学会的老师也前来向他请教,或者邀请他去讲学。

1994 年 7 月恰遇韩先生 70 大寿,为了感谢和表彰韩先生对北大图书馆编目工作的突出贡献,图书馆于 7 月 21 日在会议厅召开了庆贺生日座谈会,

编目部全体人员参加,时任北大图书馆党委书记的隋凤花、馆长林被甸、常务副馆长戴龙基都出席了座谈会,会后在图书馆大门集体合影。韩先生以研究馆员职称(正教授)于 1992 年 68 岁时正式离休,享受“正局级”待遇,但他离而不休,仍坚持每日骑自行车来图书馆,在业务上答疑解惑,还积极学习有关 MARC 格式的资料,旁听 USMARC 及光盘编目系统的培训,对计算机编目进展情况十分关心,后来从 70 岁至 72 岁的两年期间,只要身体条件许可,每天上午仍会来半日,是义务性质并非返聘,编目部为他保留着办公桌,后来因年老体衰才最后离开他所热爱的岗位,但有时还会趁到校机会来看望大家。后来韩先生因长期患肺部疾病,身体逐渐衰弱,于 2009 年 5 月 6 日凌晨在睡梦中安详去世,享年 85 岁。

韩先生不仅对北大图书馆,而且对国内西文编目事业都奉献了全部智慧和精力,他的学术影响力超越了北大图书馆范围,他曾担任全国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以及第六分会委员、教育部图书系列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1990 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韩先生在图书馆工作的 20 年,恰恰是在传统的手工编目时期向计算机编目过渡的转型时期,在他的主持下,北大图书馆编目工作在国内率先引进了国际先进的编目理念和方法,保证了西文编目质量,为日后建立编目数据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在 21 世纪的编目事业中,互联网相当于高速公路,数据库相当于仓库,那么书目记录就相当于产品,虽然这种比喻未必很准确,但对用户来说,无论任何时代,产品质量永远是第一位的。在向现代化图书馆编目事业的转型阶段,韩先生毫无疑问地起到了杰出引导者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韩荣实. 怀念荣宇大哥[J]. 燕大校友通讯, 2009, 56(9): 90-91.
- 2 何宝星, 沈桓. 哲人其萎 谨志哀思: 韩荣宇校友逝世[J]. 燕大校友通讯, 2009, 56(9): 86.
- 3 林明, 王静. 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行者: 纪念梁思庄先生诞辰 100 周年[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8(5): 105-109.
- 4 韩荣宇. AACR2 中统一题名的使用[C]//北京大学图书馆. 西文图书编目标准化与自动化研讨会会议录. 北京: 北京大学图书馆, 1983: 126.
- 5 林明. 北京大学图书馆卡片目录的变迁与兴衰(1918-2003) [C]//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第十二届五四科学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 北京大学图书馆, 2016: 351-353.



- 6 韩荣宇.在卡片式目录中如何处理新旧款目的矛盾[J].图书馆学通讯,1986(1):54-58.
- 7 沈正华.用初心铭记岁月:我与北大图书馆一起成长[G]//我和我的祖国:北大老同志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忆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180-181.
- 8 林明.与时俱进,自强不息:一个老图书馆人的足迹[G]//我和我的祖国:北大老同志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忆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247-251.
- 9 韩荣宇.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图书编目工作的历史沿革[G]//纪念建馆九十周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同人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1992:64-67.
-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100871
收稿日期:2024年1月15日
修回日期:2024年2月18日
- (责任编辑:关志英)

Active Promoter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Language Cataloging in China

—Dedicated to the Centennial of the Birth of Mr. Han Rongyu

Lin Ming Wang Jing

Abstract: The article summarizes Mr. Han Rongyu'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language cataloging work in China, including addressing historical issues in cataloging,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ataloging standards, carrying out cataloging standardization, restoring and improving Western language subject catalogs, and training catalogers.

Keywords: Han Rongyu; History of Chinese Libraries; Cataloging of Western Languages

.....

(接第107页)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Scholarship Services

—Case Study of Three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North Carolina, USA

Tu Zhifang

Abstract: Digital scholarship is the latest practice and future trend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Digital scholarship services have also become a new direction for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libraries to further expand service content and connect users deeply. The digital scholarship services in libraries of Duk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and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are representative. Case study method was applied,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visit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to collect data. The designs and implementations of digital scholarship services in these three libraries were analyzed. Specifically, their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 in user surveys, gap analysis between user needs and existing services, services development, services promotion, librarian capacity building, responding to challenges and thinking about future, etc. were concluded. Compa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scholarship service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university libraries, this study intends to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libraries that plan, promote, adjust, and optimize digital scholarship services.

Keywords: Digital Scholarship Services; University Libraries; Service Design; Service Implementation; Case Study